

• 特約稿 •

從吞恨到感恩：見證白色恐怖*

王德威**

摘 要

本文從其人、其事、其文，介述漢學家孫康宜的白色恐怖經歷與回憶錄《走出白色恐怖》。文中勾勒臺灣白色恐怖高壓統治的時代背景與政治緣由，並反思事過境遷，後之來者對於恐怖與傷痕的言說與敘事之意義。《走出白色恐怖》從一家人的跨海遷徙寫起，記錄下二二八事件爆發以來接踵而至的家族厄運，此厄運牽繫著外省父親與左翼份子大舅的命運交集、孫康宜己身失語的痛苦、母親的忍辱負重、父親創傷後的噤聲……，無不揭示著歷史的非理性與恐怖的癥結。值得關注的是，孫康宜的書寫奮鬥於暴力的述說與「難以述說性」，積極寫下那些感恩與值得述說的情誼、仁愛與自尊，完成了從吞恨到感恩的心路歷程與生命見證，是我們又一次思考現代中國暴力與正義、創傷與救贖的例證。

關鍵詞：孫康宜、白色恐怖、《走出白色恐怖》、傷痕敘事、鹿窟事件

* 編按：本文原為中研院王德威院士一篇專題演講稿，發表於「第十一屆國際青年學者漢學會議：域外經驗與中國文學史的重構」（臺灣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臺灣文學研究所，2012 年 5 月 26-27 日），由王院士委託其高足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陳珮敏博士候選人代為宣讀。現刊文由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生莊家瑋同學協助註釋與摘要，中正大學中文系暨臺灣文學研究所合聘教授江寶釵博士責任編輯。英文摘要由王院士另位高足、目前任教於德州的蔡建鑫教授完成，中正大學中文系汪詩珮、臺大中文系許暉林、高嘉謙等三位教授，於英譯過程中皆慷慨地付出了心力，於此一併申謝。

** 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威斯康辛（Wisconsin-Madison）大學比較文學系博士（1982），長期任教於哈佛（Harvard）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2004 年獲選為臺灣中央研究院第 25 屆院士，現為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 Edward C. Henderson 講座教授（2004-）。近年出版著作包括：《後遺民寫作》（臺北：麥田出版社，2007）、《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現代抒情傳統四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臺北：麥田出版社，2011）……等書。

孫康宜教授是美國耶魯大學首任 Malcolm G. Chace '56 講座（東亞語言文學講座）教授，也是國際知名的漢學家。¹孫教授專攻古典文學，主要領域在六朝詩歌、唐宋詞學、晚明遺民文學以及女性文學，除了個人專著多本外，並曾主持「中國女性詩歌詩論傳統」，以及「劍橋中國文學史」²等巨型出版計畫。在英美漢學界論治學之嚴謹、任事之認真，孫教授是公認的模範。

孫教授丰姿優雅，誠懇謙和，永遠給人如沐春風的感覺。然而這樣的學者風範下卻藏著一個憂傷的故事：她曾經親歷臺灣的白色恐怖，而且是受難者的家屬。

白色恐怖是臺灣政治史的一大污點，有多少年也是島上的禁忌話題。一九八〇年代末言禁大開，以往的斑斑血淚浮出地表，成為社會共同追記、反思的宿業。但在世紀末又一波政治風潮的影響下，白色恐怖真相未必大白，反而成為不同陣營叫囂辯爭的口實。

與此同時，孫康宜教授在海外默默寫下《走出白色恐怖》。³比起檯面上涕泗交零或義憤填膺的控訴，這本回憶錄乍看之下如此直白單純，未必符合一般想像。但孫康宜要說的是，白色恐怖的曲折複雜何足為外人道？而在淚水和怨懟的盡頭，什麼樣的悼亡追憶方式纔有持續的意義？「走出」白色恐怖，真是談何容易。孫康宜教授的回憶錄不厚，卻是她蓄積多少年的勇氣才寫出的見證。

走入白色恐怖

一九四九年大陸變色，國民黨撤退臺灣。為了堅守最後的彈丸之地，在島上大舉肅清異己。五月十九日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發佈戒嚴令，六月，「懲治叛亂條例」、「肅清匪諜條例」開始實施。這段高壓統治主要發生在五、六十年代，日後被稱為「白色恐怖」高峰

¹ 孫康宜：祖籍天津，1944 年生於北平，1946 年隨父母遷居臺灣，1950 年父親被判刑十年，罪名為「叛亂罪」。1967 年移居美國，1978 年獲普林斯頓（Princeton）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曾任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館館長，耶魯（Yale）大學東亞語文系研究所所長（1983-1991，1998-2000）、系主任（1991-1997）。今為耶魯大學首任 Malcolm G. Chace '56 東亞語言文學講座教授。著作包括《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1992）、《晚唐迄北宋詞體演變與詞人風格》（1994）、《耶魯潛學集》（1994）、《耶魯性別與文化》（2000）、《抒情與描寫：六朝詩歌概論》（2001）、《我看美國精神》（2006）等書。現居美國康州木橋鄉（Woodbridge）。

² 這兩個計畫成果深受矚目，具體成果為 1999 年的 *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 以及 2010 年的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上下兩巨冊。

³ 孫康宜：《走出白色恐怖》（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初版、2007 增訂版）。《走出白色恐怖》簡體版（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本文為王德威教授為該書簡體版所作〈序言〉，並於 2012 年 5 月 26 日在國立中正大學舉辦之「第十一屆國際青年學者漢學會議」進行題為「從吞恨到感恩：見證白色恐怖」的主題演講。

時期。當時被捕處死或遭受長期監禁者，保守的估計約有八千人之譜，軍事法庭受理的案件將近三萬件，而被羅織株連，或遭誤審冤獄的例子，更不在少數。

白色恐怖的打擊對象包括知識分子、文化人、軍人、農民、工人；左翼和社會民主運動分子則首當其衝。在國民黨退守臺灣的初期，這樣雷厲風行的行動有其歷史緣由，但因此所帶來的巨大傷害卻不是幾句簡單的政治解釋所能涵蓋。已經過世的考古人類學權威張光直（1931-2001）先生在一九四九年只是中學生，就曾因為思想問題被捕，一度甚至有生命危險。⁴當代中國詩詞研究的大老葉嘉瑩教授五十年代初受到家人牽連，也曾入獄。⁵日後雷震（1897-1979）藉《自由中國》雜誌鼓吹民主自由遭到長期軟禁，⁶陳映真因為參與讀書會而銀鐐入獄，都是知識界耳熟能詳的例子。⁷

⁴ 張光直：當代考古人類學家，臺灣知名作家張我軍的次子。1931年出生於北平，1946年底回臺灣，1949年4月至1950年3月間以一個建國中學學生的身份，因涉及所謂「四六事件」而受牢獄之災。1960年獲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博士學位，歷任哈佛大學、耶魯大學人類學系教授、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1974年）與副院長（1994年）、美國科學院院士（1979年）等職務，1984年任哈佛大學 John E. Hudson 考古學講座教授。重要學術著作有《古代中國考古學》（*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中國青銅時代》等書。1998年出版回憶錄《蕃薯人的故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親身詳述「四六事件」的經過。孫康宜教授在《走出白色恐怖》中對《蕃薯人的故事》如此評述道：「幸虧張光直教授在過世之前有機會寫這本早年的自傳，給歷史作了見證。但與其說它是給歷史作見證，還不如說它是在給生命作見證。我最不喜歡看別人寫控訴文學，我認為那是沒有深度的作品。張光直這本書之所以感人，乃是因為它具有一種超越性。它不在控訴某個具體的對象，而是在寫人。它一方面寫人的懦弱、陰險、及其複雜性；另一方面也寫人的善良、勇敢、以及人之所以為人的尊嚴性。所以，他真是名符其實的人類學家……。」張我軍長子、張光直長兄張光正（1926-），也曾寫下家族追憶文字《番薯藤繫兩岸情：一個北京老臺胞的心情故事》（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

⁵ 葉嘉瑩：1945年畢業於北平輔仁大學國文系。專治中國古典詩詞，曾於臺灣大學、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等校講學，70年代末先後任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校客座教授，1996年受聘為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名譽研究員，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不列顛哥倫比亞（British Columbia）大學榮譽終身教授。著有《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中國詞學的現代觀》、《迦陵論詞叢稿》、《迦陵論詩叢稿》、《中國古典詩歌評論集》等書。1948年隨軍官丈夫趙鍾蓀至臺灣，1949年趙因被捲入匪諜案下獄，隔年葉嘉瑩教授亦因匪諜嫌疑受牽連，被盤查羈押3天後，方才釋放。這段經歷，可見於葉教授〈轉蓬〉詩自序：「1948年隨外子工作調動渡海遷臺。1949年冬長女生甫3月，外子即以思想問題被捕入獄。次年夏，余所任教之彰化女中自校長以下教員6人又皆因思想問題被拘詢，余亦在其中。遂攜哺乳中未滿周歲之女同被拘留。其後余雖幸獲釋出，而友人咸勸余應辭去彰化女中之教職以防更有他變。時外子既仍在獄中，余已無家可歸。天地茫茫，竟不知謀生何往，因賦此詩。」見長庚大學人文講座一（2007年10月5日）實錄，葉嘉瑩演講：「鏡中人影——《迦陵詩詞稿》中我的前半生」，錄音稿整理：馬嘉君，審稿：劉德玲，總校訂：簡宗梧。參「長庚大學人文講座」網站 <http://memo.cgu.edu.tw/gecc/>。

⁶ 雷震：生於浙江長興，國民黨員，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畢業，曾任國民政府法制局編審（1927）、教育部總務司長（1933）、行政院政務委員與國民大會代表（1947）等職。1949年《自由中國》半月刊在臺北創刊，擔任實際負責人，在威權年代堅持民主憲政。1958年警備總部成立，開始羅織罪名，停刊《自由中國》。1960年「雷案」發生，雷震被捕，判刑10年入獄。後遭長期軟禁至83歲去世，安葬於自由墓園，墓碑自題「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行人，中國民主黨籌備委員雷震之墓」。雷震所親身憶述「雷案」始末與《自由中國》經歷，可參氏著：《雷震回憶錄之新黨運動黑皮書》（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3）。《雷震回憶錄：我的母親續篇》（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9）。

⁷ 陳映真：小說家，原名陳映善，改名陳永善。曾創辦《人間》雜誌（1985-1989）。1967年與友人共同籌組「民主臺灣聯盟」，政府以該組織聚讀馬列共黨主義、魯迅等左翼書籍及為共產黨宣傳等「預備顛覆政府」罪名，1968年將之逮捕，入獄七年。1977年投入「鄉土文學論戰」，1988年中華雜誌社和夏

對歷經反右、文化大革命風潮的大陸讀者而言，孫康宜的白色恐怖經驗可能有似曾相識之感；比起來，白色恐怖在規模和行動上甚至可能是小巫見大巫。有多少年，歷史對兩岸的中國人都是殘暴的。但我們關心的是不論顏色、規模，恐怖一旦發生，對每一位受難者都是人格的違逆，人權的侵犯。更不堪的是，一代中國人所承受的政治暴虐和傷害，必須有好幾代人來承擔。時過境遷，後之來者要如何召喚亡靈，重新體會前人一言難盡的創傷？

一九八七年臺灣「解嚴法」生效，為時三十八年的白色恐怖正式告一段落。但真正的挑戰剛剛開始。各樣的記錄、回憶層出不窮，讓我們想起八十年代傷痕文學的狂潮。⁸隨之而來的則是一系列有關見證的問題：創傷能夠從由歷史的後見之明來彌補麼？亡者已矣，倖存者有什麼樣的資格代理那些永遠沉默者的發言權？還有，傷痕敘事也必須推陳出新麼？我們都還記得祥林嫂說故事的教訓。⁹歸根究底，述說歷史不難，述說歷史的「難以述說性」才難，因為那是永遠的心靈挑戰和道義承擔。

是在這樣的前提下，《走出白色恐怖》提供我們又一次思考現代中國暴力與正義，創傷與救贖的例證。孫康宜的父親孫裕光先生（1919-2007）是天津人，母親陳玉真女士（1922-1997）出身臺灣高雄。三十年代末，兩人都是日本留學生（孫裕光是早稻田大學的學生，陳玉真則就讀東京高女），他們相識相戀，之後回到祖國完婚，孫裕光並曾在北大擔任講師。然而這是亂世，再美麗的羅曼史也難逃命運的撥弄。國共內戰開始，孫裕光有感時局不穩，決定帶著孩子回到妻子的故鄉——臺灣。與他們同行的有孫前此在北大的同事，也是臺灣人在北京的精神領袖，張我軍先生（1902-1955）。¹⁰

潮聯合會共同成立「中國統一聯盟」，擔任首任主席。1996年獲中國社科院授予榮譽高級研究員。王德威教授的相關研究，可參氏著：〈最後的馬克思——論陳映真〉（含〈附錄：命運的經濟，末世的清算〉），《後遺民寫作》（臺北：麥田出版社，2007）。〈三個飢餓的女人〉，《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臺北：麥田出版社，2011）。

⁸ 此處「傷痕文學」係指中國1970年代末以降、80年代大行其道，描寫文化大革命所帶來之傷痛的作品。『傷痕文學』的正式提法始於1978年。這一年，上海作家盧新華（1954-）寫了一篇名為〈傷痕〉的短篇小說，描述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種種悲劇。小說固然風格粗糙、情節通俗，但卻碰觸諸多議題，如政治狂熱與倫理親情、集體歇斯底里症與個人傷痛、信任的背叛、青春的浪費等。這篇小說感動了數以百萬的中國讀者，也讓許多作家群起效尤，透過書寫傷痕，展開靈魂的探索。」參王德威：《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全新增訂版（臺北：麥田出版社，2011），頁246、281。

⁹ 就這一點，筆者曾有所追問：「難道最慘烈的苦難經過幾次表述以後，也需要重新包裝，好再激起同情與義憤？」「我們立刻想到的例子是魯迅的〈祝福〉（1924）。命運多舛的祥林嫂第一次講述她的悲慘故事時，不由人不感動掉淚。她那些賺人熱淚的遭遇甚至吸引了不少外地人專程前來聽她的故事。祥林嫂的故事和她說故事的情境形成一種消費苦難的『奇觀』；這樣的奇觀就算對祥林嫂毫無意義，卻讓聽眾有了廉價的，『蕩氣迴腸』（catharsis）的滿足感。即使如此，祥林嫂的聽眾還是很快就厭倦了她那呆板、一再重複的故事。她迅速變成了笑柄，最後被村人棄若敝屣地忘了。」王德威：《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全新增訂版（臺北：麥田出版社，2011），頁289。

¹⁰ 張我軍：原名張清榮，作家、文藝理論家、翻譯家，臺灣新文學運動健將，並曾翻譯大量日語著作。一生輾轉廈門、上海、北京、臺灣，旅居大陸多年。

一九四六年春天，年輕的夫婦和兩歲的女兒康宜還有出生剛滿三個月的長子康成來到臺灣。孫裕光在基隆港務局謀得一職，原以為找到安身之處，殊不知厄運才剛剛開始。隔年二二八事件爆發，時任行政長官的陳儀（1883-1950）施兵鎮壓，大開殺戒，一時風聲鶴唳，本省人外省人一同遭殃。這場事件也埋下日後臺灣省籍糾紛的禍根。四〇年代末國共內戰局勢逆轉，臺灣一夕數驚，就在此時，白色恐怖的陰影來到孫家。一九五〇年春天，孫裕光突然遭到逮捕，因為莫須有的罪名判刑十年，家產盡被查抄。如他日後所寫道，「大禍忽然臨到我們全家，一個幸福快樂的家庭，一夕之間墜入憂傷痛楚的流淚之谷。」¹¹

這年孫康宜六歲。她所記得的是半夜軍警突然闖入家中，將父親用手銬押走的混亂；是母親走投無路，攜帶三個年幼的子女逃到高雄鄉下避難的驚恐。我們不難想像，這樣的經驗對一個剛懂事的孩子所帶來的惶惑與屈辱。以後十年，孫康宜隨著母親還有兩個弟弟避居臺灣南部，有寄人籬下的日子，也有苦中作樂的日子。她的母親堅此百忍，付出一切心力維持家庭。與此同時，孫裕光先被遣送綠島，再移回臺北監獄。探監成為這個家庭最重要的假日節目。一九六〇年孫裕光刑滿獲釋，此時孫康宜已經高中二年級了。

但這只是故事的一半。時間過了三十五年，九〇年代中期，孫康宜偶然發現她的大舅陳本江（1915-1967）與臺灣五〇年代鹿窟事件的糾葛。鹿窟位於臺灣北部山區，五〇年代初期曾經號稱為島上最大左翼武裝根據地，一九五二年為國民黨軍警殲滅。而鹿窟的領袖之一正是陳本江。¹²

陳本江留學日本時期與孫裕光成為同學好友，也促成了孫和妹妹陳玉真一段因緣。抗戰後期陳本江也來到北平，一直到一九四八年才回臺灣。陳浪漫多才，留學期間顯然已經傾心左翼理想，他的中國經驗尤其讓他體會革命之必要。五〇年代初他奉命進入鹿窟，伺機行動。就在此時孫裕光被捕，原因無他，保密局希望從他身上套出陳本江的下落。

憑著遲來幾十年的線索，我們終能拼湊出孫家悲劇的來龍去脈。一個中國天津來的青年和一個臺灣高雄來的青年在日本結為好友，他們的友誼後來發展成姻親關係。然而造化

¹¹ 這是孫康宜教授父親在日記中所寫文字：「1950年頭，大禍忽然臨到我們全家，一個幸福快樂的家庭，一夕之間墜入憂傷痛楚的流淚之谷。」

¹² 鹿窟事件：孫康宜教授於書中描述：「一直到1995年，我才偶然從別人那兒聽說，原來大舅（按：陳本江，原名陳大川）就是當年1950年代初臺灣鹿窟事件的領袖。……鹿窟是個臺灣地名，位於臺北附近，而鹿窟事件是臺灣有史以來最重大的政治案件之一。據說，鹿窟組織是由一群反對國民政府的鄉民組成，1952年冬國民黨的保密局人員前往鹿窟逮捕該組織的鄉民，並當場槍殺數百人，自此鹿窟基地才完全被消滅。」下文並引述臺北「二二八紀念館」所展出有關鹿窟事件的解說：「1952年12月29日凌晨，軍警包圍石碇鄉鹿窟鄉、汐止鎮一帶山區，逮捕數百名村民，以組織『臺灣人民武裝基地保衛隊』之名，槍決36名，已知判刑1至15年不等者共計97人，刑罰總計871年之長。涉案者中，從外地進入山區的主謀可能是社會主義者（按：即陳本江），但被牽連的村民大都是礦工、農人等尋常百姓。事件爆發後，在嚴刑逼供下，親族相互牽連，一家數口同時被槍殺或入獄者不計其數，無辜悲情難於盡言。這是臺灣1950年代最重大的政治案件之一。」

弄人，他們各自見證了臺灣白色恐怖的不同面向。孫裕光和臺灣妻子在戰亂中結為連理，他們沒有政治企圖心，但時代的紛亂卻將他們捲入政治漩渦。另一方面，陳本江是典型的浪漫革命家，為了心目中的理想，犧牲一切上山打游擊。何其反諷的是，鹿窟事件的嚴重性遠遠被誇大。而事件之後，陳本江只坐了三年牢就被釋放，用以作為國民黨寬大為懷的樣板，反倒是孫裕光堅不合作，被判刑十年。¹³無論如何，白色恐怖為兩人的生命帶來重挫。陳本江的後半生無限頹唐失意，英年早逝。孫裕光皈依基督，一九七八年輾轉來美，成為大學教師和志願傳道人。

孫康宜筆下遭受白色恐怖經驗的其實不止她的父親和舅父。前文提到的張光直也出現在她的回憶錄裡，張光直的父親就是當年一起和孫家渡海回臺的張我軍。張光直是張我軍的次子，一九四六年同家人回到臺灣。一九四九年，還在念高三的他對左翼思想發生興趣，結果被捕入獄，經過一年之後才得釋放。這一年的牢獄之災讓張光直直面人性最堅強，也最醜陋的兩極；他於是竟對人類學發生興趣。另外，孫康宜在探尋陳本江的鹿窟冒險時，發現他與「臺灣第一才子」呂赫若（1914-1951）生死與共的情誼。¹⁴呂赫若一九三五年崛起臺灣文壇，同時在聲樂界一鳴驚人；儘管前程似錦，他卻更鍾情左翼運動，也因此結識陳本江。一九四九年呂還曾舉辦過音樂演唱會，不久後神秘失蹤。多年後證實，他追隨陳本江進入鹿窟，一九五一年前後意外遭到毒蛇咬傷，竟因此而死。

在臺灣解嚴以前，白色恐怖是不能聞問的禁忌，倖存者守口如瓶，罹難者則根本死無對證。張光直日後成為名滿天下的哈佛教授，但一直要到上個世紀末才寫出十七歲那年的遭遇。呂赫若的名字和作品也是九十年代才重新受到注意，他的死因到今天仍然眾說紛紜。孫康宜的大舅早逝，她的父親對自己的過往也多半保持緘默。

白色恐怖最後的恐怖是，哪怕客觀環境改變，也永遠讓生者無言以對，逝者不能瞑目。緬懷往事，這是孫康宜最艱難的挑戰。為她的至親之人，為她自己，她要如何走出白色恐怖？

走出白色恐怖

¹³ 書中說道：「有人說，大舅之所以沒被槍斃（他手下的中間幹部全被殺害），乃是因為政府要把該組織的『頭子』留給人看，讓人知道國民黨政府是『不咎既往』的。在那以後，大舅坐了3年牢，於1955年出獄。」

¹⁴ 呂赫若：本名呂石堆，生於臺中豐原，臺中師範學校畢業，集教員、音樂家與作家於一身，被譽為「臺灣第一才子」。戰後，對二二八事件前後的臺灣文化多所關注與行動，進而投入左翼地下反抗工作，活動於臺北鹿窟武裝基地。在世時出版過日文短篇小說集《清秋》（1944年），身後有多部專集出版，包括：林至潔譯：《呂赫若小說全集》（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5；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6）。鍾瑞芳譯：《呂赫若日記》（臺北：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5）。

孫康宜是白色恐怖間接的受害者。她六歲那年的遭遇要等到半個多世紀以後才得以述說，這漫長的等待可能包含了什麼意義？如上所述，臺灣一九八七年戒嚴以前，官方對白色恐怖刻意抹煞，當事人也多半諱莫如深。何況孫康宜本人早在一九六八年就離開臺灣，與事件發生的現場和關係人自然有了隔閡。更重要的原因應該是對她的父母輩而言，往事不堪回首，就算有話要說，也有不知從何說起的困難。失語的痛苦不只是因為來自外部的壓力，也更是因為當事人內心驅之不去的創傷。

孫氏夫婦在一九七八年由子女協助來美定居。回首前半生的經歷，他們必定有恍若隔世的感覺，孫裕光此時已是虔誠的基督徒，甚至改名孫保羅；他們寧願以寬恕的心面對過去。但作為人子，豈能容父母和他們那個時代所曾經受的苦難就此湮沒？往事不能如煙！

然而一旦提起筆來，孫康宜才了解她自己又何嘗不深陷失語的痛苦？走出白色恐怖的第一關就是說話問題。孫康宜生於北京，在說京片子的環境中長大，即使到了臺灣，也依然隨著父親京腔京調。一九五〇年父親入獄後，母親帶著三個孩子回到高雄鄉下避難，「印象中，到了林園之後不久，或許是為適應周圍的環境，我很快就把北京話全忘了，此後一年，我整天只說臺語。」南臺灣是閩南語系居民的大本營，孫康宜入境隨俗，自然講起了臺灣話。但是她的北京話這麼快就「全忘了」，當然事出有因。失語的悲哀也是失父的悲哀，這是書中最令人揪心的部份。一年以後，孫康宜又開始學起「國語」，但因為老師生就有本地口音，這次學得的國語是臺灣腔的「臺灣國語」。「嚴格的說來，它應當是我的第三母語。」

這一口臺灣國語成為孫康宜成長過程中傷害的印記。國民黨政權推動文化正統性時期，全民說國語是首要目標，相對於此，臺灣話是方言，是粗鄙落後的語音象徵。¹⁵孫康宜的尷尬是，父親是外省人，又生於北京，理應會說「標準」國語。她的臺灣腔其實是後天環境使然，或者更吊詭的，是推行標準國語的國民黨所強加於她的。但外人疑惑或輕視的眼光不會因此稍歇。有很長的時間，這使得孫康宜自卑甚至自閉。多少年後她到了美國，得以盡情地說英語——她的第四母語，她才擺脫了臺灣的「語言的牢籠」。

這語言的牢籠不也正是白色恐怖——或任何顏色的恐怖——的癥結？在威權政治統治下的人是沒有隨心所欲的說話，或不說話，的自由。孫康宜的大舅陳本江為了表達革命理想，不惜放棄大好前程。孫康宜的父親因為沒有說出保密局要聽的話，

¹⁵ 1945年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臺灣後，1946年設立「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1984）推行國語運動，以恢復國語、掃除日文、禁止方言為原則，屬中國正統性文化重建意識型態下強制性的全民單語政策。直到2003年教育部國語會通過「語言平等法」草案，2007年公佈「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並由行政院通過，方明確立法規範政府不得以公權力禁止或限制任何語言與文字之使用。

落得十年監禁。他日後在基督信仰裡找到與上帝對話的管道，即使如此，他始終不能從人間失語的症候群裡復元。

但《走出白色恐怖》最值得注目的意義不僅在於挖掘、哀悼那曾經使人失語的原因或痛苦而已。透過這本回憶錄，孫康宜更要探問，一旦理解了失語的前因後果，我們的下一步是什麼？西方從事浩劫文學研究的學者已經一再告訴我們，任何想還原現場，控訴不義的努力都帶有內在的悖反性。就算千言萬語，我們又怎能夠僭越受難者永遠被剝奪的說話位置？暴力之所以「罄竹難書」，正是因為暴力所帶來的恐怖已經超過了語言文字的表意範疇，直指文明的非理性黑洞。

但即使如此，傷痕見證者還是得勉力找尋述說的方式。這裡的邏輯是，哪怕暴力帶來的恐怖難以述說，我們也要說出這恐怖的「難以述說性」，以為抗衡。孫康宜教授的強項之一是六朝文學，可以指出一千五百年前寫《蕪城賦》的鮑照（414-466）就已經有了類似認知。《蕪城賦》描述的是宋孝武帝（430-464）因為內亂而在廣陵肆行屠城，帶來大毀滅。鮑照怵目驚心之餘，只有浩嘆「天道如何？吞恨者多！」

在「失語」和「發聲」不斷搏鬥的過程裏，我們揣摩逝者的心聲，也同時承認自己的局限。問題是，書寫難道只能慨嘆天道無親，記錄一次又一次「吞恨者」的憾恨？在這一點上，《走出白色恐怖》做出相對積極的回應。誠如孫康宜所言，她的回憶錄不必只見證不義，訴說傷痕。她更希望寫出一本感恩之書，感謝那些在孫家最苦難的時候，對他們施予救助的那些人。

換句話說，孫康宜不願意只扮演「吞恨者」或為「吞恨者」發言的角色；她更要作感恩者。她要強調在暴力的彼端，更有強大的救贖力量——家族的，社會的，甚至宗教的——值得述說，而且同樣是無論怎麼說，也說不盡。這，纔是「走出」白色恐怖的關鍵。

閱讀《走出白色恐怖》，我們於是理解在種種有關迫害、離散、監禁、或死亡的敘事中，親情的表述——尤其是夫妻的恩義之情，家族和手足的呵護之情，人子的孺慕之情——如何為冰冷的歷史注入一股暖流。孫康宜的父親入獄後，她的母親卻傲然獨立，不畏旁人眼光，教養三個子女，等待丈夫歸來。她在鄉下開洋裁班，掙來辛苦錢養活一家；她不辭舟車勞頓，一次又一次帶著孩子到北部探監。母親一向被稱作美人胚子，但對孫康宜而言，她的美來自她堅毅的性格，她對家、對生活本身的信念。

孫康宜的父親在監獄中歷盡痛苦，以致在綠島服刑期間曾經企圖自殺。但在偶然的機緣裡，他竟在島上發現一顆臺灣少見的紅豆——相思豆——並且珍而藏之。多少年以後，這顆紅豆轉到孫康宜手裡，此中無限的情義傳承，從夫妻到父女，不問可知。孫裕光逐漸從《聖經》裡找到寄託。苦難開啓了救贖的契機。一個被屈辱的靈魂在另

一個天地裡發現信仰與愛的真諦。當他出獄時，他已經是個虔誠的基督徒了。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孫家是外省人和本省人共同組織的家庭。孫裕光落難後，全仗妻子方面的家人伸出援手。即使偶有齟齬，家族的力量應該是讓孫家撐下去的原因。白色恐怖中外省籍受難者有太多在臺灣無親無故，他們生前死後完全無人搭理。比起來孫裕光畢竟是幸運的。尤其臺灣在經過二二八事件後，孫家的故事有了一層族群相互扶持的深意。孫康宜尤其感謝二姨一家的關愛，後來二姨的次子張欽次博士竟成為她的先生，這是另一段親上加親的佳話了。而張欽次營救孫裕光夫婦離開臺灣，過程的曲折複雜同樣令人感動。

孫康宜的有情之筆更及於家族以外的人。她的老師同學，教會長老，美國友人，甚至萍水相逢的三輪車伕，他們或是見義勇為，或是出於惻隱之心，及時給予幫助，陡然使孫康宜的世界充滿溫暖。這是她書寫的最終目的吧。往事不能如煙：不能忘記的不只有苦難和冤屈，還有仁愛與自尊。

比起許多白色恐怖受難者的遭遇，孫康宜父母的故事有個苦盡甘來的結局。而最讓我們動容的不只是她的父親與母親相互信守的深情，也是他們各自在極度孤絕的情況裡，所煥發的自尊力量以及超越苦難的決心。這一力量和決心也許來自傳統的影響，也許來自宗教的信仰，無不顯示一種對人與人間親愛精誠的信念。《聖經，以弗所書》的話：「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

走過白色恐怖正猶如走過死亡的幽谷，孫康宜以她父母親的經歷，記錄了一個不義的時代，卻也是一個有情的時代。但她何嘗不也為自己所得自父母的言教身教，作出殷殷回顧。他們的委屈和抗爭俱往矣，但他們的子女終要以最素樸的方式來訴說。政治的激情有時而盡，倫理親情的曲折綿長，反而成為記憶現代中國歷史的另一種資源。從吞恨到感恩，這是孫康宜給我們的啟示。

引用書目

一、近人論著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臺北：麥田出版社，2007年。

——：《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臺北：麥田出版社，2011年。

呂赫若：鍾瑞芳譯：《呂赫若日記》，臺北：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著，林至潔譯：《呂赫若小說全集》，臺北：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

孫康宜：《走出白色恐怖》增訂版，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

——：《走出白色恐怖》簡體版，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

張光直編：《張我軍文集》，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9年。

——：《蕃薯人的故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年。

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臺北：人間出版社，2002年。

——：《番薯藤繫兩岸情：一個北京老臺胞的心情故事》，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年。

許俊雅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6：張我軍》，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2年。

楊紅英編：《張我軍譯文集》，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11年。

雷震：《雷震回憶錄之新黨運動黑皮書》，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3年。

——：《雷震回憶錄：我的母親續篇》，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9年。

Kang-i Sun Chang and Haun Saussy, eds. *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Kang-i Sun Chang and Stephen Owen,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長庚大學人文講座

<<http://memo.cgu.edu.tw/gecc/>>

From Grief to Blessing: A Testimony of the White Terror

David Der-wei Wang*

Abstract

This essay discusses Professor Kang-i Sun-Chang's—a renowned scholar of Chinese literature—first-hand experience of the White Terror and her memoir *Journey Through the White Terror*. The essay explain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political context of the White Terror in Taiwan, a period of intense governmental surveillance and suppression, and reflects on what narratives and discourses about such (post)trauma mean to the following generations. *Journey Through the White Terror* begins with the Sun family's cross-strait move and continues to record a series of ordeals that fell upon the family after the eruption of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The ill-fated Incident linked together the life of Sun's father, a Chinese Mainlander, and her mother's older brother, a leftist; it brought to the author a painful loss of paternal care, to her mother much toil and labor, and to her father a post-traumatic self-silencing. Their stories reveal the irrationality of history and many symptoms of terror. What is noteworthy is that Professor Sun-Chang's writing casts light on the struggle between narrating violence and its “impossible narratibility,” thereby leaving records of her blessings, of support, friendship, and love for her family, and of self-esteem. Her memoir is a testimony to a tremendous transformation of a life that was full of grief to a life full of blessings; a testimony that allows us to reconsider violence and justice, as well as trauma and salvation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Taiwan and China.

Keywords: Kang-i Sun-Chang, White Terror, *Journey Through the White Terror*, Trauma narrative, Luku Incident

* Edward C. Henderson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Department of East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U.S.A.

